

## 義和團事件中英國對列強遣軍 的顧慮及其籲請日本出兵之意義

韓翔中\*

本文所欲探討的是英國政府在義和團事件之初(駐北京使館遭困)所採取的政策。文章分為五節，導論中提出問題意識，也就是救援與侵略的分野問題及其緊張性；第一節介紹義和團事件爆發之初，英國政府內部意見之分歧；第三節則探討英國籲請日本政府出兵的過程；第三節則分析日本出兵問題所引起的爭議，由此兼論各國的立場與思量；結語則綜合先前各節，呼應問題意識。

在義和團事件最初，英國首相兼外交部長莎士保理(Marquis of Salisbury, 1830-1903)決定等待西摩爾(Sir. E. Seymour, 1840-1929)援軍的消息，即便與北京通訊中斷，他也不願輕舉妄動。但大沽口衝突顯示清政府與列強已處於實際作戰狀況，莎氏意識事態之嚴重後同意自印度派兵，而其保守性格仍不願接納內閣成員邀請列強共同出兵的建議，以免造成不必要的糾葛，此舉遭到急於救援的內閣成員批評。相較於聯軍可能造成救援行動變質為列強競爭，莎氏寧願具地利之便的日本能夠搶先拯救北京的

---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公使團，但他不願「邀請」日本出兵，一方面秉持救援是共同責任的精神，一方面避免他國懷疑。但同時日本政府也因得不到列強的正式支持而不願速派大軍，始終有所顧慮，而英國積極促請日本發兵的舉措也引起德、俄之嫌棄。此嘗試失敗之後，「八國聯軍」的成行已成無法避免。

關鍵詞：莎士保理、義和團、八國聯軍、英國對華政策

## 一、前言

本文所欲探討的是英國政府在義和團事件之初所採取的政策，探討的時段約為八國聯軍進軍北京之前夕(1900年6月至7月)。「八國聯軍」一詞，已成為吾人對義和團事件的代稱。這個歷史名詞所造成的印象，基本上便是列強聯合侵略中國，但若吾人深入檢視所謂「八國聯軍」的形成過程，將會發現其釀成其實違反諸多列強之打算，其中英國便是極為抗拒此事的國家之一。八國聯軍經常為東方人所忽略的一個內涵，便是列強「勢力均衡」(或制衡，balance of power)的相互掣肘，國家眾多所代表的未必是對中國鯨吞的巨獸，而可能緊盯他人而未敢輕易下箸的緊張對峙，故八國聯軍反而顯示中國應不會遭受瓜分。對列強而言，救人急務與政治考量孰輕孰重在實際狀況中成為一大難題，畢竟北京外人生死未卜且清廷政局混沌未明，侵略戰爭與救難任務可說是一線之隔。

在列強母國政府皆與駐北京使館通訊中斷後，使館唯恐覆滅。此一駭人聽聞的消息重擊歐洲，若駐北京使節與外國人果遭屠戮，此乃國際外交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慘案，是西方人所謂「違反人性之罪」(crime against humanity)，這對文明教化相對普及的西歐社會乃是一大衝擊，連年邁的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都曾表示因憂慮受困者安危而寢食難安。面對此劫，先不論列強各自真正的動機或心思為何，他們都號稱共同目標乃是拯救在北京被圍困的使館及外國人。由此在事件之初，急速出兵救援是英國社會輿論所向，也是內閣多數成員的主張，但當時的首相兼外交部長莎士保理(Marquiss of Salisbury, 1830-1903)卻有其他考量，反對閣員提出各國組成聯軍救援的想法。稍後莎氏對列強競爭的疑慮，導致他以鼓勵日本盡速出兵的方式企圖取代推動聯合出兵；但此過程中日本與他國的外交猜疑，使得日本並無全速進軍救援，而是等待各國軍隊的集結，最終才形成了「八國聯軍」。

據此，聯軍的形成過程及各國態度值得吾人深加討論，而本文乃以英國政策出發，以當時的日本出兵問題為討論重心，並兼論他國之決策。在

十九世紀末期，英國雖仍是在華利益最大宗，但基於列強競爭之加劇，其政策已採守勢。義和團事件爆發之際，避免情勢再度惡化為政治問題乃是英國想要努力的目標，但救人義務又責無旁貸。本文分為三節，首節介紹義和團事件爆發之初，英國政府內部意見之分歧；次節則探討英國籲請日本政府出兵的過程；第三節則分析日本出兵問題所引起的爭議，由此兼論各國的立場與思量。在前人的研究中，莎士保理看待義和團事件的謹慎態度曾被點出，但是不曾深入探討或分析其政策思維，英國籲請日本迅速增援之失敗也曾被討論，但一般都歸咎於俄國之冷漠，對此二者加以一貫的解釋也是本文的目標所在。

## 二、莎士保理對列強遣援的顧忌

從 1900 年 5 月後期開始，義和團騷亂的形勢急速惡化。<sup>1</sup>在 5 月 21 日時，英國駐華公使竇納德(Sir. Claude MacDonald, 1852-1915)尚認為德國使節建議的海軍示威並無必要；<sup>2</sup>但義和團於 28 日攻擊了北京至漢口鐵路的外國人工作場所，鑒於義和團在北京附近的暴亂越見嚴重，各國駐華公使於當

<sup>1</sup> 竇納德自 1900 年初以來盡量避免為義和團事小題大作。但至此時連一向最反對列強示威的俄國公使在 5 月後期也承認情形之嚴重。竇氏於 5 月 21 日中的電報中寫道：「先前格爾思先生(Mr. Giers, 俄國駐華公使)說，只有兩個國家在中國具有重大利益，即英國和俄國。他認為衛隊登陸和海軍示威都應受到勸阻，因為這會引起一些我們所不知道的後果。然而自本月 18 日以來，他承認問題嚴重，並且立即同意提出聯合照會。」*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BPP)*, China No. 3 (1900), No. 43,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1 May 1900, 27. 有關竇納德的持重或樂觀態度與北京公使團面臨義和團威脅時的作為，見 Edmund S. 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891-190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6), 144-160.

<sup>2</sup> 有大量天主教徒的法籍主教急切呼籲，而由法國公使首先於 5 月 20 日提議調兵來京保護，而竇納德於當時認為尚無必要。*BPP*, China No. 3 (1900), No. 42,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1 June 1900, 27. *Confidential Print*, 7470/102,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1 May 1900, from Ian Nish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DFP)*,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1. 關於法人的處境，可見邵興國，〈法國與義和團運動〉(成都：西南交通大學碩士論文，2007)，19。

日一致決定要從天津調來使館衛隊，<sup>3</sup>不過使館衛隊總數僅數百人可知公使團仍不認為情勢惡劣，這個保衛是屬於預防或象徵性質。在鐵路暢通的情形下，衛隊不到兩天就到達了，但稍後情勢卻急轉直下，甚至北京與外地的交通與通訊有被切斷的危險。6月4日，竇納德向政府警告道，一旦使館通訊被切斷，須要求各國立即派出援軍。<sup>4</sup>在此告急的電報傳來後，莎士保理隨即調集英國在華軍隊準備救援事宜，他通知英國在華艦隊指揮官海軍中將西摩爾(Sir. E. Seymour, 1840-1929)，給予他充分的裁量權(wide discretion)來採取可行的保護措施，又指示可將香港、威海衛與新加坡可騰出的軍力全數調到大沽口。<sup>5</sup>西摩爾接到訓令後立即預備派遣援軍，並請纓擔任指揮官，<sup>6</sup>6月9日時，公使團已認為需要強力軍隊之馳援，10日，西摩爾接獲竇納德的求救電報：「情勢萬分嚴重，若不設法立刻向北京進軍就來不及了(Situation extremely grave. Unless arrangements are made for immediate advance to Peking it will be too late)！」<sup>7</sup>由此他立即決定率領兵力超過2000人的各國聯軍(英國士兵約占半數)向北京出發，但沒想到才經過一天，援軍便因鐵路受到破壞而困於半途並通訊斷絕。<sup>8</sup>

<sup>3</sup> 但駐華公使們向總理衙門保證衛隊人數會很少，證明此時事態尚未失控。BPP, China No. 3(1900), No. 48,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7 May 1900; No. 49,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7 May 1900; No. 53,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9 May 1900; No. 55, MacDonald to Salisbury, 30 May 1900, 28-30. *Confidential Print*, 7470/107, MacDonald to Salisbury, 28 May 1900, from *BDF*,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11.

<sup>4</sup> 竇納德認為情勢並不如法國公使所認為的嚴重，但狀況惡化乃由於中國政府的冷漠。若通訊中斷，請求各國艦隊指揮官協調救援行動。BPP, China No. 3 (1900), No. 68, MacDonald to Salisbury, 4 June 1900, 34.

<sup>5</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92, Foreign Office to War Office, 8 June 1900, 41.

<sup>6</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80, Foreign Office to Admiralty, 6 June 1900; No. 87, Seymour to Admiralty; No. 91, Foreign Office to Admiralty, 8 June 1900, 38-41.

<sup>7</sup> 竇氏急於讓西摩爾出發的可能原因是遵從莎士保理的訓令原則，希冀搶先平亂來避免俄軍至北京。BPP, China No. 3 (1900), No. 103, Inclosure, 10 June 1900, 45. 及E. S. Wehrle, *Britain, China, and the Antimissionary Riots*, 171. 俄公使也傳達同樣訊息予母國政府，可見事態嚴峻為真確。見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京：三聯書局，1957)，駐北京公使密電，1900年6月9日，220。

<sup>8</sup> 6月4日，在法國公使建議之下，各國公使們同時向政府報告，可能隨時被包圍並切斷聯繫。當時各國海軍將領已經被通知，但未收到國內明確命令。10日，與他國海軍將領同在大沽口的西摩爾接到竇納德在8點半發出的求救電報，他帶領一批海軍混合部隊出發，最終軍隊總數有兩千多人。西摩爾是當時的最高將領，故由他統率

由於憂慮列強採取軍事行動再次造成瓜分中國的危機，莎士保理在此態勢下仍表示義和團動亂是地方性暴動，不應「小題大作」。但其他內閣成員卻認為事態嚴重，救人一事乃十萬火急，莎氏的態度被他們抱怨為消極無為，事實上這是他在事件過程中持續被批評之處。<sup>9</sup>6月12日，莎士保理尚告訴駐日公使薩道義(Sir. E. Satow, 1843-1929)，義和團之事「不致無法收拾」(will not come too much)。但自11日西摩爾援軍失聯後，14日北京的電報通訊也中斷，此後華北的消息只能從駐天津領事賈禮士(William Richard Charles, 1848-1929)之處獲得，而面對這個情形，莎士保理決定等待。此處值得探究的是，在通訊中斷狀況之下亂事程度不明，莎氏卻認定義和團事件不會太嚴重，這顯然是一種推論或決策而非情報所致。從莎氏對女王的報告應可稍微了解其推理，他於16日告知女王道：「義和團只是一群暴民(the Boxers were a mere mob)。」故北京的外國人應不會受到嚴重威脅。<sup>10</sup>以亂事性質而論，義和團確實是暴民的行動，其擴散的一大可能便是清廷的支持，此事若真則使館目前防衛根本不足抵禦；但因目前資訊尚不足判斷拳亂係屬民間起事還是清廷扶持，若實情屬前者而列強卻小題大作急於派兵搶救，其結果必然導致中外衝突。

但在另一方面，其他心急的內閣成員持不同看法，他們認為北京的失

---

這支軍隊。11日，由於鐵路與橋梁受破壞，軍隊在廊坊受阻。西摩爾稍後決定回到天津，18日，軍隊受到中國軍隊的攻擊，直到23日，大沽口的聯軍救援天津成功，26日才將西摩爾的軍隊帶回天津。關於西摩爾聯軍的出征始末，參見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跨國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263-270。從西摩爾的軍隊數量可知當時動亂的嚴重程度仍被低估。這也源於長期以來(尤其1895年以後)列強輕視中國軍力，因此常有小隊外國武裝軍隊可以長驅直入中國的論調。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Longmans, 1910), vol. 3, 213.

<sup>9</sup> C. J. Lowe,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vol. I, 237.

<sup>10</sup> 此時正好又有英國駐北京使館秘書回到倫敦進行彙報，其表示除非清朝政府加入義和團，否則不需擔心北京當地歐洲人的生命安危。Quotes from Satow diary, 12 June 1900, Satow MSS, PRO 30/33/16/3; and tel. Salisbury to Queen Victoria, 16 June 1900, Salisbury MSS, 3M/A/84/114; Memo. Bax- Ironside, 'Local Situation in Peking', 19 June 1900, Salisbury MSS, 3M/A/106/30. 以上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Great Power Rivalry and British Isolation, 1894-190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84-185.

聯證明動亂茲事體大，需要立即增援。早在 6 月 6 日時，印度部部長漢彌爾頓(Lord George Hamilton, 1845-1927)便私下責怪莎士保理的態度是「無可救藥的軟弱」，其政策是讓問題「隨波逐流」(To let things drift)。<sup>11</sup>外交部次長布羅佳克(St. John Brodrick, 1856-1942)也同樣感到不滿，於是他在 11 日主動建言西摩爾的軍隊需要增援；12 日，在其他內閣成員巴福爾(Arthur Balfour, 1848-1930)、殖民部長張伯倫、海軍部長戈遜(George Goschen, 1831-1901)的支持下，他進一步建議英國必須和日、俄合作並邀請兩國出兵(俄國與日本各四千人，英國兩千人)，且華北的軍隊需要建立統一指揮權。<sup>12</sup>英國內閣的想法是希望透過事先的協調來避免列強的忌妒與牽制，以企求救援任務之成功；莎氏其實動機相同但較為悲觀謹慎，導致其被批評為被列強競爭觀念所囿而「執迷不悟」(L[or]d Salisbury has been in his most wicked mood)。由此，莎士保理拒絕在收到竇納德或西摩爾的消息前貿然行動。他認為：「如果西摩爾可以成功，屆時便不需要俄國人；如果他無法成功，那麼有俄國人也沒用。」莎氏認為賈禮士對威脅遽增的報告可能是「感覺」(rather sensational)而非實情。他持論若英國和俄國聯合行動，俄國在華軍力將使其占盡優勢；況且西摩爾與竇納德都沒有請求更進一步的軍事行動，除非肯定二人已無法再行使職權，否則他拒絕介入。<sup>13</sup>布羅佳克則諷刺地向柯嵩(Lord Curzon,

<sup>11</sup> Hamilton to Curzon (private), 6 June 1900, Hamilton MSS, MSS.Eur.C.126/2. 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5.

<sup>12</sup> Brodrick to Salisbury, 11 June 1900, Midleton MSS, PRO 30/67/5. 以及 Quotes from Brodrick to Curzon (private), 15 June 1900, Curzon MSS, MSS.Eur.F.111/10A; Brodrick to Salisbury, 12 June 1900, Midleton MSS, PRO 30/67/5. 布羅佳克的思考是，雖然英國出兵較少，但是可以支持日本來制衡俄國。Brodrick to Curzon (private), 15 June 1900, Curzon MSS, MSS. Eur. F. 111/10A. 以上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5-186.

<sup>13</sup> Salisbury to Brodrick (private), 15 June 1900, Midleton MSS, PRO 30/67/5. 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6. 此時莎士保理想將動亂侷限在地方性的態度並非特別。6月中旬，德國外交部長布婁也認為當時在中國的軍隊已經足以平亂且恢復秩序。Lascelles to Salisbury (no. 155, confidential), 15 June 1900, *BD* ii, no. 2. 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6. 俄國外相Mouravieff的說法也是要強調華北動亂狀況不需多慮，他告訴英國駐俄大使中國中南地區所受到的威脅高於華北。*BPP*, China No. 3 (1900), No. 120, Scott to Salisbury, 13 June 1900, 53-54. 其中都有列強競爭的思考。由此可知英國內閣對於救人乃是特別積極！

1859-1925，時任印度總督，為前任外交部次長)埋怨莎士保理「看不到任何危險。他說西摩爾沒有要求，那是因為通訊被切斷了！」<sup>14</sup>但莎氏的考量其實頗為合理，蓋軍力大小所牽涉者不單是援救力量，而更重要的是予清廷的觀感，數百人的衛隊與兩千人援軍的若不足應對危機，軍隊數量再增加將導致此事性質轉為國家之衝突。不過布羅佳克顯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認為莎氏的主張是源於低估危機的嚴重程度或誇張他國之惡念。

義和團事件進一步惡化是因列強軍隊與中國軍隊的對抗造成。6月14日，賈禮士從中國傳回可怖消息，據報慈禧太后決定在兩天後摧毀各國使館。<sup>15</sup>由於這個緊急的消息及西摩爾聯軍之受困與失聯，發出最後通牒(ultimatum)不果，各國海軍指揮官於17日決定攻陷大沽口；<sup>16</sup>大沽口陷落之後，同日天津租界便遭到中國軍隊的砲擊。由於中國的正規軍隊參與了大沽口與天津的衝突，顯示中國與列強實際上已經在戰爭狀態，<sup>17</sup>因為若非透過外交手段先與清廷協調，在此情勢下進軍必定被中國視為侵略，很明顯的，莎士保理最初將亂事侷限在民間暴動性質的期望或企圖至此是落空了，如今拯救行動則改指從仇外的清廷手中救出使館，由此只得派出大軍，救援要務與侵略戰爭可能失之毫釐，謬以千里。在戰爭陰影的威脅下，隔日(6月18日)英政府決定派遣一萬名印度軍隊前往中國；<sup>18</sup>當天在上議院，莎士保理表示：「目前我們能夠做的，就是給予我們的代表絕對的裁量權，並且有能力派遣多少軍隊就派遣多少(to forward as many troops as we can)。」<sup>19</sup>

雖然英國決定大量派兵，莎氏卻始終拒絕外交部次長布羅佳克的聯軍

<sup>14</sup> 'He will not see any danger. Says the Adm[ira]l hasn't asked—wh[ich] as his communication was cut is no wonder.' Brodrick to Curzon (private), 15 June 1900, Curzon MSS, MSS. Eur. F.111/10A. 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6.

<sup>15</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27, Carles to Salisbury, 14 June 1900, 55.

<sup>16</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86, Bruce to Admiralty, 17 June 1900, 關於各國將官對奪取大沽之決議，參見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286-296。

<sup>17</sup> William L. 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New York: Knopf, 1956), 694.

<sup>18</sup> 至6月21日時印度已共派出了16000兵力。Hansard, 4rd S., vol. 84, "Indian Military Establishment," 21 June 1900, c. 626.

<sup>19</sup> 'At present all we have been able to do is to inform those who represent us that their discretion is absolute, and to forward as many troops as we can.' Hansard, 4rd S., vol. 84, "China—Anti-foreign Disturbances," 18 June 1900, c. 259.



邀請提議，他認為各國只需要各自採取行動即可，軍事行動細節可再由當地軍官協調。而內閣成員們認為不發起聯軍則力量不足，布羅佳克曾分別於前述 14 日與 21 日兩度提議向列強發起聯合軍事行動，但皆遭拒絕；莎氏堅持一貫的立場，表示這個危機只是「地方局部的」(local)，若英國主動邀請他國(無論是哪一國)，他憂慮對方除了要求代價之外，亦擔心列強軍隊的增加會「連累」(compromise)英國的行動。<sup>20</sup>大沽之戰後，在眾內閣成員支持之下，布羅佳克於 22 日內閣會議中再次提出多國聯軍的營救計畫，會中莎士保理終於同意各國可派遣一萬軍力，但堅持列強之間不需有正式的諒解。<sup>21</sup>內閣多數認為事先溝通有助於釐清誤會，但莎氏則持相反意見，力主不須邀請，不應溝通才能使救援行動的性質單純化。稍後布氏繼續施壓，倡議敦請日本立即派遣兩萬五千人至三萬人的軍隊，至此莎氏則坦言告知其自身觀感並點出英國與其他國家的差異，他認為「俄國、德國、日本事實上不甚在意使館的處境」。<sup>22</sup>([n]either Russians, Germans, nor Japanese cared much what happened to their Legations.)莎氏指出的這三國皆非西歐國家，也就是說，非西歐國家因政治民主化較低，較不需顧慮社會輿論觀感，因此其主要考量更是現實政治利害問題，反之，英、法、美對於救助生命的重視程度則較高。也就是說，救援已是各國的共同義務，協調一事不應由母國政府進行，只需在華指揮官就軍事實際狀況溝通合作。<sup>23</sup>若有國家需要英國加以邀請才願發兵，則其必然心思不純。自始至終，莎士保理堅持不邀請列強出兵，這是因為他認為馳援乃是各國自身的責任義務，英國主動「邀請」不只

<sup>20</sup>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Athlone Press, 1970), 308.

<sup>21</sup> 巴福爾、張伯倫、戈遜與財政部長畢曲(Michael Hicks Beach, 1837-1916)都支持之。此時莎士保理乃是獨排眾議。

<sup>22</sup> 莎士保理還搬出協商的技術性困難作為理由，稱俄國與德國大使生病，俄國外交部長莫拉維耶夫數天前去世故難以有快速的協商。可見其拖延等待之心意。Memo. Brodrick, 'Position at Taku', 25 June 1900, Midleton MSS, PRO 30/67/5; and to Curzon (confidential), 29 June 1900, Curzon MSS, MSS.Eur.F.111/10A. 引自 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7-188.

<sup>23</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Die Grosse Politik der Europäischen Kabinette, 1871-1914*)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第2卷，第4568號，〈駐俄大使上德帝國總理〉，1900年7月12日，48-49。

無理，反可能被他國視為求助而要求代價，而國家越多則政治因素越濃，他企圖避免這場救援最終成為「在華的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 in China)。<sup>24</sup>

### 三、英國籲請日本出兵的過程

基於內閣數度請命，加以英國大軍已發則他國也必然跟進之下，進軍北京已屬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若以盡速遣援為務，列強援軍難以即時到達中國，能最迅速出兵者乃是日本(位置接近華北)。對莎士保理而言，最佳的結果便是事件盡速落幕，避免聯軍成形，因此他決定開始詢問日本的行動計畫，但最初並不願「邀請」日本出兵。其實自危機之初，日本便曾詢問各國意見，早在6月13日時，日本已向英國表示若西摩爾聯軍遭遇困難，其擬派遣一支數量可觀的軍隊前往援救，在一週之內便可登陸萬人，但除非英國政府「同意」否則將不派遣之。<sup>25</sup>日本政府此舉是希望得到列強的寄望與支持，但當時莎士保理不擬熱切回應。15日，莎氏要日本代辦懷特赫德(J. B. Whitehead, 1858-1928)詢問日本政府考慮採取什麼作為，日本當時僅派遣一千多兵力到大沽口，而此後日本仍無加派大量軍力，直到22日其仍表示其無意派兵超過三千人。<sup>26</sup>22日內閣會議之後，莎士保理要懷特赫德再次「詢問」日方，表示英國已派大軍，但「鑒於事件的急迫性，日本的有利地理位置使其意圖成為非常重要的因素」(The urgency of immediate action

<sup>24</sup> 王世宗，〈「新帝國主義」中的逆流：莎士保理與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120。 “[W]e must not invite the Japanese or Americans, who are nearest or can effectively assist, to do so, or they would expect something in return. We should not communicate with the Russians or the German. To get more foreigners there might compromise the Admiral or Sir C. MacDonald.” Brodrick to Curzon, 15 and 22 June 1900, Curzon Papers. 引自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308.

<sup>25</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201, Whitehead to Salisbury, 14 June 1900, from *BDFP*,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19.

<sup>26</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21, Whitehead to Salisbury, 13 June 1900; No. 134, Salisbury to Whitehead, 15 June 1900; No. 141, Whitehead to Salisbury, 16 June 1900; No. 156,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0 June 1900; No. 169,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2 June 1900, 54-68.

and the favourable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 Japan makes her intentions a matter of very grave importance in this difficulty)這個說法，<sup>27</sup>等於已對日本出兵表達同意。以外交的考量而言，若英國直接請求日本出兵，這類表態必然見疑於他國，莎士保理此舉與其說是請求，不如說是鼓勵；<sup>28</sup>傳達英國也派兵的訊息已經是足夠的暗示，從訊息內容可知他認為救援之事人人有責，不應由某國主動發起。<sup>29</sup>因此，即便決定更進一步鼓勵日本出兵，此時英國政府仍不願直接表態支持日本派兵，有議員(Sir E. Ashmead-Bartlett)於 26 日在下議院詢問政府是否會商請日本出兵時，巴福爾回答道：「談論正在進行的協商是不適合的，英國政府歡迎任何有兵力接近華北地區的列強立刻派兵。」<sup>30</sup>從「歡迎」與「邀請」在用詞上的細微差別可見，此番發言一方面呈現了英國以單純救援為尚之目的，另一方面則否認英國政府特別支持某國出兵以避免外交齟齬。

日本政府內部對於出兵有急進與持重兩派，但其目標同為提升日本的國際地位。1895 年「三國干涉還遼」的經驗，使得日本政府此時舉措特為拘謹，首相山縣有朋(Yamagata Aritomo, 1838-1922)與陸軍大臣桂太郎(Katsura Tarō, 1848-1913)都反對貿然出動大軍，決定等待他國乞求援助再出兵，方為「揚眉吐氣」之時。<sup>31</sup>日本早已籌備出兵，但最終端看列強的態度。因此對日本而言，莎氏此種「精神鼓舞」並無實際助益，其反應仍然十分被動。

<sup>27</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70, Salisbury to Whitehead, 22 June 1900, 69.

<sup>28</sup> 但英國也同時發給美國類似的訊息，這樣就可避免單獨邀請日本可能引起的問題。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71, Salisbury to Pauncefote, 22 June 1900, 69.

<sup>29</sup> 6月25日，莎士保理告訴本駐英代辦，‘I pointed out to him that considerable time must elapse before the relief from India or Europe could arrive, and that Japan was situated in a manner more favourable for immediate action.’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90, Salisbury to Whitehead, 25 June 1900, 78.

<sup>30</sup> Hansard, 4rd S., vol. 84, “China—Anti-Foreign Disturbances: Japanese Assistance in Suppression,” 26 June 1900, c. 1117.

<sup>31</sup> Ian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 1869-194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53; I. H. Nish, “Japan's Indecision During the Boxer Disturbanc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0, No. 4 (Aug., 1961), 449-450. 關於日本出兵華北考量與始末，可參見吳文星，〈庚子拳亂與日本對華政策：出兵華北〉，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十三篇庚子拳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193-228。

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Viscount Suizo Aoki, 1844-1914)曖昧地表示，英國於6月22日的詢問不太像是詢問，而像是「建議」，而日本政府是在等待較佳的行動機會。這番言論是試探英國公開支持的意願，其意已表明日本有派兵的能力，只待他國明白的聲援或求援，這也證明日本所求的同意其實是「請託」或「保證」。<sup>32</sup>另一方面，日人按兵不動的主要憂慮自然是俄國，其一方面擔心俄國會在此事上擁有軍事優勢，但又恐自身出兵會刺激其敵意。<sup>33</sup>隔天日本外相又向懷特赫德宣讀了大沽傳來的電報，內容敘述形勢之嚴重且急切要求派軍，但他並不表達日本的立場，只急於確認其他列強的計畫，<sup>34</sup>明白呈現日本必須取得他國認可方可能遣援，或至少不能處於獨立行動的孤勢。<sup>35</sup>

日本的態度頗為明白，即便擁有大軍，它也不願冒獨立行動搶先平亂而遭杯葛的危險，除非其能獲得充分保證而免於俄人的妒忌。在洞悉日本的心結之下，莎士保理只能無奈地承擔發起人的角色，替日本爭取其他國家的同意，寄望其能盡釋疑慮並搶先出兵。25日，英政府分別詢問德、俄、法是否同意日本派遣大軍，<sup>36</sup>莎士保理向德國表達望其支持而獲得俄人首肯

<sup>32</sup> 日本外交部長說，22日的電報 'was considered by them to be not so much a mere inquiry as a suggestion. It was possible for them to reply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nd they have chosen what seemed the preferable course by mobilizing their troops.'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13,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8 June 1900, 82. Confidential Print, 7487/67,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6 June 1900, from B 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135.*

<sup>33</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87/64,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0 June 1900, from B 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132.*

<sup>34</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80,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3 June 1900, 72.* 懷特赫德報告道，日本外務大臣將此電報念給他聽，並表示 'his Government, desirous of conforming their resolves to those of the Powers interested, were anxious to know what measures our Government proposed to take immediately to meet the actual necessities of the case.'

<sup>35</sup> 至少英、德都必須同意，日本才有可能擺脫三國干涉遼遠時期被孤立的夢魘。T. G. Otte, *The China Question*, 188. 懷特赫德觀察日人行動的條件應為英、德的保證。*Confidential Print, 7487/66,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5 June 1900, from B 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134.*

<sup>36</sup> 'I request that you will inquire of the Russian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whether his Government will give their approval to dispatch of a Japanese force of from 20,000 to 30,000 men, if Japanese Government are willing to undertake i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的訴求，因為日本若無取得列強保證則不會提供實質的援助。<sup>37</sup>莎氏也深知此舉可能被解釋「此地無銀三百兩」，故特別指示駐俄大使史考特(Sir Charles Scott)向俄國新任外交部長藍姆斯多夫(Count Lamsdorff, 1845-1901)提到日本派兵問題時，要特別提及英國假定俄國也會盡速派員，且英國已經從印度派遣一萬兵力，其意是再次強調其目的為共同救援，期盼以公正態度降低俄國的戒心。<sup>38</sup>雖然莎士保理曾擔心邀請日本可能使其要求代價，但他最終決定主動促成此事，除了時間緊急之外，也有避免節外生枝的企圖，意即如果可以讓日本搶先發兵平亂，那麼列強就失去了讓大量軍隊進軍北京的理由；在此「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考慮下，他選擇邀請各國支持日本出兵。隔天，日本馬上表示已備妥一個萬人師團(加上已派遣的兵力總數達一萬三千人)，隨時可以派遣，<sup>39</sup>對比其四天前才表示無意派遣超過三千人之立場，顯見日本實在謀求列強之付託，其延遲派兵明顯「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40

史考特告知藍姆斯多夫，救援乃是首要目的，雖然英、俄皆已盡速遣援，但明顯仍不能即時拯救北京使館，故應重視有充足兵力之日人。<sup>41</sup>在英國徵詢各國對日派兵意見後，俄國馬上回應歡迎日本派大軍援助，表示它

---

order at Tien-tsin and Peking.'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88, Salisbury to Scott, 25 June 1900, 75. 參見H. B.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264-265.

<sup>37</sup> 'I hope the German Emperor will concur in our wish to procure such an assurance from Russia, and that His Majesty will be willing to lend us his assistance in obtaining it.'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91, Salisbury to Gough, 26 June 1900, 75-6.

<sup>38</sup> '[Y]ou may draw his Excellency's attention to the following consideratio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assume that the Russian Government will further reinforce their troops speedily, and are themselves sending some 10000 troops from India; but it is clear that these reinforcements will not arrive in time to rescue the two forces at present surrounded or the Legations at Peking.'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89, Salisbury to Scott, 25 June 1900, 75.

<sup>39</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193, Whitehead to Salisbury, 26 June 1900, 76.

<sup>40</sup> 懷特赫德就告訴莎士保理，日本要準備一支大軍大約只需四天時間，但他個人認為日本政府不太可能派遣一支龐大的軍隊。*BPP*, China No. 3 (1900), No. 190, Salisbury to Whitehead, 25 June 1900, 75.

<sup>41</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34, Scott to Salisbury, 29 June 1900, from *B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38.

擁有與他國相同的行動自由(liberty of action)，尤其因為日本已經堅定表達與列強合作之意。<sup>42</sup>與前任外長莫拉維耶夫(Count Mouravieff, 1845-1900)消極態度有別，藍姆斯多夫歡迎日本或任何國家在「共同目標」(common aim)的前提下派遣兩萬至三萬軍隊，其用詞與巴福爾的說法幾乎相同。<sup>43</sup>反而是德國的曖昧說法為實際之抗拒，德國外交部長布婁(Count von Bülow, 1849-1929)表面聲稱歡迎所有可以穩定秩序的行動，但又宣稱不知日本行動細節而疑慮第三國利益可能受影響，故德政府須在確認後方能贊成。這個說法其實等於在表示日人之宣誓為不可信。另外，美國回覆道十分樂意日本出兵，<sup>44</sup>法國政府對於使館安危其實深感焦急，但因為法俄同盟故，它一直等到俄國答覆後才回應，表示因全歐都對當前危機無能為力，希冀日本立即動員。

45

在俄國表示同意之後，莎士保理於 7 月 2 日再次詢問日本的意向，但日本依然瞻前顧後，對派遣大軍仍表為難，疑慮列強進軍北京反可能刺激屠殺，且至少要七萬軍隊方為足夠；<sup>46</sup>事實上，日本政府真正的想法是相信救援已不可能(在 7 月底之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知道使館是否倖存)，大型軍事行

<sup>42</sup> 'We can only highly appreciate the sentiments expressed by Japan in present circumstances, as also her view of Chinese affairs. We have no desire to hinder her liberty of action, particularly after her expression of a firm intention to conform her action to that of the other Powers.' 以日、俄關係而言，這套說詞可稱友善。BPP, China No. 3 (1900), No. 241, Inclosure 2, 26 June 1900, 94; No. 210, Lamsdorff to Scott, 28 June 1900, 81-2; No. 216, Lamsdorff to Staal, 28 June 1900, 83; No. 211, 29 June 1900, 82; No. 241, Scott to Salisbury, 29 June 1900, 93.

<sup>43</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46, 4 July 1900, 96. 俄國在說法上對象必須是全體列強，以免造成特別支持日本的印象或效果。

<sup>44</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4, Salisbury to Lord Pauncefoot, 3 July 1900, 3.

<sup>45</sup> 至6月27日時法國仍未表態。BPP, China No. 3 (1900), No. 203, Monson to Salisbury, 27 June 1900. 到了7月4日，英國駐法大使蒙森(Edmund Monson, 1834-1909)報告他與法國外交部長德卡賽的談話，德氏看來十分沮喪，表示 '[T]he whole of Europe appears to be powerless to enforce this rescue as against the Chinese was overwhelmingly terrible to him.....He hoped, therefore, that the division which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as understood to have mobilized would be dispatched at once.' BPP, China No. 1 (1901), No. 13, Monson to Salisbury, 5 July 1900, 6. 德卡賽稱日本乃是目前危機的關鍵因素。Confidential Print, 7470/45, Monson to Salisbury, 4 July 1900, from BDF,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44.

<sup>46</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48, Aoki to Whitehead, 4 July 1900, 97.

動甚至對北京的佔領近乎必然，它最重視者乃是避免與其他列強發生衝突而非解救使館，<sup>47</sup>即便日方增派大軍，也絕不單獨入北京，此與莎士保理的期望背道而馳。對此他只能繼續「鼓勵」日本先行出兵，莎士保理於 4 日正式告知日本公使：「日本是唯一可以迅速增兵馳援至天津的國家。歐洲列強對此行動並無異議(Japan is the only Power which can send rapid reinforcements to Tien-tsin. No objection has been raised by any European Power to this course)。」<sup>48</sup>在列強逐漸表態之下，日本當局逐漸由少數出兵論轉為大量出兵論，不過對單獨出兵與自由行動之主張最終作罷，無意搶先進行救援；<sup>49</sup>當天，日本終於決定動員大批軍隊。<sup>50</sup>

莎士保理向日本傳達列強態度的訊息，實為多此一舉，因為英國無此義務替他國傳話，也無與日本的私下協議，此舉只是再次向日本表示誠意而已。德國駐英大使哈茲斐特(Count Hatzfeldt, 1831-1901)數度詢問莎氏是否曾給予日本任何軍事保證，他答覆道：「貴使也許了解英國之性格是如何不願為他國承擔軍事義務。」<sup>51</sup>7 月 6 日，莎士保理為扭轉日本能轉變心意，乃主動將其敦促日本派兵馳援的電文通知各國，<sup>52</sup>布羅佳克也在下議院公開

<sup>47</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124, 5 July 1900, 56-58.

<sup>48</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52, Salisbury to Whitehead, 4 July 1900, 98.

<sup>49</sup> 吳文星，〈庚子拳亂與日本對華政策〉，209-213。

<sup>50</sup> 懷特赫德在 7 月 4 日下午與日本外務大臣談話結束後返回使館時，收到了莎士保理的電報。當晚他就收到青木願意派遣大批軍隊的備忘錄。從日本態度轉變之大，應是日本在收到英國稱各國無反對訊息後的決策，將其視為某種保證。值得玩味的是，在此備忘錄之中，日方說詞含糊，且並未提及營救使館，由此可再次證明日方的思維。‘Japanese Government consider troubles in north of China much more deep-rooted and of far wider bearings than might appear. While prepared to take full share in concerted action, they realize that expedition to Peking i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will require a very large force. In view of this they think it highly advisable that Powers concerned should now exchange views as to joint measures to be taken to meet eventualities.’ 懷特赫德解釋道，他認為日本的意思是將會在先前列強的共識之下派遣一支大軍。*BPP*, China No. 3 (1900), No. 260, Whitehead to Salisbury, 5 July 1900, 100.

<sup>51</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 2 卷，第 4532 號，〈哈茲斐特致外交部〉，1900 年 6 月 26 日，18。

<sup>52</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68 & No. 269, Whitehead to Salisbury, 6 July 1900, 102.

聲明，英國政府期待且歡迎日本派兵，且歐洲列強對此並無異議；<sup>53</sup>對照 6 月 26 日執政黨在下議院表示歡迎所有列強派兵援助，英政府前後說法一致，並無特別偏待日本之處。同日，莎士保理告知駐英日本代辦，若日本有物資或技術上的困難，英國政府願提供經濟支援，但他同時責備日本若實際上有能力卻延遲援救，必須為此負很大的責任(if they delay, heavy responsibility must rest with them)，他勸戒日本應仿效英國一樣嚴格區分(a sharp distinction)救援與未來的行動，日人須將所有的顧慮歸類為後者，不要使其影響前者。<sup>54</sup>其實莎士保理提出經濟支援的做法，與轉達列強無反對訊息的做法意義類似，精神性遠超過實際功能，因為當時日本國力已擁數十萬軍隊，問題絕不在於經費。<sup>55</sup>勸告日本不要把政治考量(未來行動)與道德作為(救援)混雜一事很明確地表達了英國政府企圖將軍事行動單純化的努力。日本若為政治利益而延宕救援，固然不必承擔法律責任，且一國政府無權責備另一政府對於拯救己國國民失敗為怠忽職守，但以道德立場而言此乃「無為之過」(sin of omission)，莎士保理竟對日本加以深責，在政治中實屬罕見之

<sup>53</sup> 'In the opinion of the Commanders an increase of force is required before an advance can take place. With respect to this we are hourly expecting a reply from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our communications.' Hansard, 4rd S., vol. 85, "China—Anti-foreign Outbreak: Japanese Help in Suppressing Disturbances," 5 July 1900, c. 617.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have received assurances from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hat the prompt despatch by them of a large force to Ta-ku would be welcomed by us; that no objection has been raised by any European Power to this course.' Hansard, 4rd S., vol. 85, "China—Anti-foreign Outbreak: Japanese Help in Suppressing Disturbances," 6 July 1900, c. 774.

<sup>54</sup> 'Japan is the only Power which can act with any hope of success for the urgent purpose of saving the Legations, and, if they delay, heavy responsibility must rest with them. We are prepared to furnish any financial assistance which is necessary in addition to our forces already on the spot.....Her Majesty's Government wish to draw a sharp distinction between immediate operations which may be still in time to save the Legations and any ulterior operations which may be undertaken. We may leave to future consideration all question as to the latter.' *Confidential Print*, 7470/49, Salisbury to Whitehead, 6 July 1900, from *BDF*,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49. 懷特赫德也告知青木，他已受到四封莎氏訓令要求他請日本派兵營救使館，他個人認為若北京外人罹難，日本的無所作為將受文明世界的批判。*Confidential Print*, 7487/319, Whitehead to Salisbury, 9 July 1900, from *BDF*,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223.

<sup>55</sup> 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軍力有二十多萬，1904年日俄戰爭日本所動用軍力約三十萬人。



事。無怪乎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對莎氏的評論頗不以為然。

莎士保理認為不應該給予日本政治上的保證，更不願與他國締結密盟，但希望能夠提供物質援助來表達英國支持日本出兵之意，但也再次希望此事無涉國際競爭。故他提議，為了避免國際協商浪費時間，英國決定自行負擔日本的軍事開銷。<sup>56</sup>也正在當天，日本內閣會議正式決定緊急出兵，自認各國將因此銘感在心。<sup>57</sup>數小時之後英國收到日本的消息，日方表示將增加總軍力至兩萬人，<sup>58</sup>比原本又多了七千人，但仍舊不符英國以立即進軍所需為訴求之數。<sup>59</sup>7月10日，莎士保理再度呼籲日本，首先，他告知日本駐英代辦列強皆已派兵，但集結時間將遲至八月又適逢雨季，詢問日本立刻派遣兵解救使館；日本代辦則回應道：「日本政府會像其他列強做得一樣多，但要做更多有困難(to do the same as other Powers, but they apprehended difficulty if they did more)。」可見日本政府的心思並未因莎士保理的勸說而改。領會日本的意向之下，莎氏無奈地以政治理由加以勸說道，若日本無為而動亂擴散導致中國瓦解，俄國將在華北佔盡優勢；並於最後表示英國已盡量派兵，圖於「共同目標」下「盡力而為」(we were doing all we could in the common cause)。<sup>60</sup>翌日(7月11日)，日本政府表示在莎士保理的「友善保證」(friendly assurances)之下，他們將再增派一至二個師。<sup>61</sup>對此莎氏決定再奮力一搏，他於13日另提出一項建議，若日本願意立即進軍北京解圍並加派兩萬軍力，英國願意給予一百萬兩的援助，<sup>62</sup>但日本政府至此正式拒絕加派兵力。<sup>63</sup>若有此等軍力，日本便能在列強軍隊集結前獨自挺進北京，

<sup>56</sup> 'In the circumstances we are prepared to undertake this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since a fatal expenditure of time would result from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s on the point.'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66, Salisbury to Whitehead, 6 July 1900, 102.

<sup>57</sup> 吳文星，〈庚子拳亂與日本對華政策〉，214。

<sup>58</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67, Whitehead to Salisbury, 6 July 1900, 102.

<sup>59</sup> 當時一般認為進軍北京所需軍力大約要四至五萬，此時各國在天津與大沽的軍力總數大約有一萬多人。

<sup>60</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123, Salisbury to Whitehead, 10 July 1900, from *BDF*,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57.

<sup>61</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23, Whitehead to Salisbury, 11 July 1900, 9.

<sup>62</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32, Salisbury to Whitehead, 13 July 1900, 13.

<sup>63</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38, Whitehead to Salisbury, 14 July 1900, 14.

<sup>64</sup>若非如此，就算日本日後又增兵，日軍到達中國的時間已經與他國相差無幾，那英國的邀請將意義大減，故此後莎士保理放棄對日本的呼籲。<sup>65</sup>莎氏此番鼓勵且責備的作為，加上英國及列強的反應皆不符日本的期望，邀功不成反受譴責，使日本政府頗感不快，故日本政府在出兵後卻反對此舉是英國遊說造成；<sup>66</sup>事後日人曾要求英國外交部不要將此段提供經費的通訊刊出，但英國藍皮書卻加以刊載，使日本頗為惱怒。<sup>67</sup>

#### 四、日本出兵問題引起的爭議

此番英國積極居中協調而日本躊躇不定的波折，反使俄國逐漸狐疑英、日可能別有居心，疑懼英國將利用他國來賦予日本某種特殊權力。<sup>68</sup>俄國因此宣告反對授予日本獨立行動的權力，在 7 月中引起一樁爭議的插曲。俄國在 7 月初雖曾表示極度反對授予某國獨立行動的權力(in face of so grave a crisis there were objections to a mandate being given to any one Power)，<sup>69</sup>但當時藍姆斯多夫認為日本政府「並沒有要求授予他們在恢復天津和北京的秩序中採取獨立行動的權力，而是希望在此緊急關頭與歐洲各國部隊忠實地合作」，<sup>70</sup>一直到 7 月 4 日為止，俄國都對日本出兵表示樂見其成。<sup>71</sup>但數日後，俄國政府卻對日本可能要求委任特權表達憂慮(the possibility that Japan

<sup>64</sup> 這也是大約後來聯軍進軍時的總數。

<sup>65</sup> 日本軍隊則於19日到達天津，在華日軍達22000人，成為聯軍主力。邵蔚，〈從日俄協商到日英同盟〉(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12。

<sup>66</sup> 吳文星，〈庚子拳亂與日本對華政策〉，214-215。日本媒體報刊特別強調日本派兵非為本國利益，乃是為了世界文明，在歐人請求下才出兵。見李煒，〈論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態度的變遷：以日本報刊輿論為中心〉，《東岳論叢》34.7(2013.07)：98-101。

<sup>67</sup>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駐倫敦代辦急件〉，1900年8月15日，234-237。

<sup>68</sup>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代理外交大臣致旅順口海軍中將阿萊克謝耶夫密電〉，1900年6月28日，222-223。

<sup>69</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38, Scott to Salisbury, 3 July 1900, 92.

<sup>70</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42, Scott to Salisbury, 4 July 1900, 15-17.

<sup>71</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46, Scott to Salisbury, 4 July 1900, from *B 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44.

might want a mandate for separate action or special conditions for her co-operation)。<sup>72</sup>7月13日，藍氏向史考特解釋，俄國自初便支持日本出兵，但後來卻對英政府給予各國通知內容感到疑慮，因為其中「不只是授予日本救援使館與外國人的任務，而且還包括了鎮壓義和團，以及重建北京與天津的秩序」，這違反了列強共同行事的「基本原則」(fundamental principals)，可能導致破壞各國的合作及釀成中國瓜分的結果。<sup>73</sup>可見俄國是對英政府積極的作為起疑，懷疑英國計謀讓日本搶進北京並影響中國政局以圖利自身。

從莎士保理對於俄國政府的回覆，吾人可見其再次呼應從事件之初他拒絕聯軍提議的態度。莎氏於15日回覆道，英國政府不曾主張日本有可以獨立行動的特權，更重要的是他強調：「英國政府除了救援使館與外國人之外，從無支持任何一種對進一步行動的意見。」由此再度可見莎士保理將列強行動限制於單純救援性質的努力。另外值得注意者，雖然藍氏所提及的原則是指列強合作援救使館，莎氏卻仍否認英國政府曾接受蘭姆斯多夫曾提及的「共同基本原則」，此因若列強開始協商共識或諒解，便違背莎氏主張各國個別拯救的用心，他選擇直接說明救援以外別無目的，才是避免列強利益糾結的唯一途徑。<sup>74</sup>20日，莎士保理又指示駐各國大使轉告列強，英國從來沒有建議要特別授權日本，<sup>75</sup>各國都表示了解英國並無如此要求，甚至俄國的盟友法國也如此主張。<sup>76</sup>英國政界與輿論媒體因此認為是俄國在

<sup>72</sup> '[N]o one Power should be given a mandate for separate action, or any special conditions, or any claim to preponderating voice in guidance based on the relative amount of force supplied or the services rendered to the cause.' *BPP*, China No. 1 (1901), No. 18, Lamsdorff to Scott, 8 July 1900, 8.

<sup>73</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29, Lamsdorff to Russian Chargé d'Affaires in London, July 13 1900, 11.

<sup>74</sup>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never suggested that the action of Japan should confer on her any rights to an independent solution or any other privileges....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not expressed an opinion in favour of any steps except those which point to the relief of the Legations and of other foreigners.' *Confidential Print*, 7470/182, Salisbury to Scott, 15 July 1900, from *BDF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67.

<sup>75</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242, Salisbury to Currie, also to other ambassadors, 20 July 1900, from *BDF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83.

<sup>76</sup> 法國回應其不知說英法有要求授權，也對英、俄之間交流的細節不知情；義大利也說其並沒有收到如此提議；奧國於表示眾所皆知英國無要求如此授命，德國則晚至28日才回覆。*BPP*, China No. 1 (1901), No. 57, Monson to Salisbury, 21 July 1900; No.

杯葛日本，蘭姆斯多夫為此喊冤。<sup>77</sup>22日，他向史考特澄清俄國絕無阻撓日本之意，他承認英方的確無委任一類用詞，但表示這不單只有俄國誤解，德國對英國的作為也有相同解讀。他表示，俄國政府之所以感到疑慮，是因為他們自初便表示日本有與其他列強相同的權力，但英國在疏通過程中卻有些詞句像是在授予日本特殊任務；如今誤會澄清後，俄國仍歡迎日本「如其它列強在面對共同危難時」(equally with the Powers concerned in meeting the common danger)的幫助。<sup>78</sup>經過將近一個月，俄國的說詞其實與最初一樣，就是日本跟他國擁有相同的權力。這也顯示其實俄國的漸生疑竇其實頗為合理，若列強不表反對，為何英國仍要頻頻推動甚至公開替他國向日本聲明？箇中原因便在於日本的遲疑與英國的鼓勵。過去學者也多論斷日本延遲出兵是遭俄國的杯葛，但事實上此乃日本自身的顧慮所致。也因此，英國政府並無對俄國的解釋提出任何質疑。<sup>79</sup>

探究各國對日本派兵的態度，最不友善者實為德國。法國雖為俄國盟友，但因其為民主國家與傳教大國故焦急萬分，法國外交部長德卡賽 (Théophile Delcassé, 1852-1923) 多次表示對此事心急如焚，<sup>80</sup>稱其對於日本派兵所造成的英俄爭議實無興趣。<sup>81</sup>而德國對此事的考量自初便是報復而非救援。從德國外交文件中可見，德皇威廉二世不但不願讓日人擔任援軍主力，甚至不願讓俄人主導。由於德國公使受戕，再加上北京的德國傳教士數不多，因此拯救神聖使節並非德皇心中首務，在他看來，義和團事件是一場

---

58, Currie to Salisbury, 21 July 1900; No. 66, 21-26; No. 87, Gough to Salisbury, 28 July 1900, 37-38.

<sup>77</sup> Hansard, 4rd S., vol. 85, "China—Anti-foreign Outbreak: Co-operation Of Japan In Suppressing Disturbances," 10 July 1900, c. 1107-1108.

<sup>78</sup> *BPP*, China No. 1 (1901), No. 63, Scott to Salisbury, 22 July 1900, 23-24; No. 86, Scott to Salisbury, 23 July 1900, 36.

<sup>79</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256, Scott to Salisbury, 22 July 1900, from *B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86.

<sup>80</sup> 德卡賽稱此有如噩夢，使他陷入極為緊張而沮喪的情緒中。*Confidential Print*, 7470/217, Monson to Salisbury, 18 July 1900, from *B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81.

<sup>81</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249, Monson to Salisbury, 21 July 1900, from *B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84.

亞洲對歐洲文明的戰爭。<sup>82</sup>固然德國官員未必有此極端觀點，但自初便不以救援思考此事則為共通，外交部長布婁頗樂見英日與法俄集團利益衝突的加劇。<sup>83</sup>當英國雖懇請德國在日本派兵事上給予支持以說動俄人，如時在倫敦的英駐德大使拉賽爾斯向哈茲斐特呼籲援救任務刻不容緩，宣稱日本絕無在達成任務後追求特殊利益的可能，蓋列強軍力隨後即到。<sup>84</sup>但德國心意早決並回覆英國道，德國雖歡迎任何有助於恢復中國秩序的行動，但因未悉日人計畫，故不能承擔支持日本之責任。<sup>85</sup>德皇對於英國的建議堅決反對，<sup>86</sup>他為了想當主角竟不希望事件太快平息，他曾表示不讓俄國或日本一枝獨秀而踢開歐洲，要以德國部隊為公使復仇(7月3日，德國決定派七千遠征軍至中國)，<sup>87</sup>其費盡心力希望避免日本單獨行動但缺乏有力理由，只能勸誡日人勿在戰力不足之下貿然行動。<sup>88</sup>德國的作為造成張伯倫等立場親德的英國政要大失失望，而7月初俄人對英國推動日本出兵一事的疑慮逐漸加深(也受德國委託解釋的影響)，這也使英國政界與輿論懷疑德、俄私下勾結。

<sup>82</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27號，〈威廉二世致布婁〉，1900年6月19日，12。

<sup>83</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28號，〈布婁致威廉二世〉，1900年6月19日，12-13。

<sup>84</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34號，〈哈茲斐特致外交部〉，1900年6月26日，19-20。

<sup>85</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70/22(i), Memorandum by Bulow, 28 June 1900, from *BDF*,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36.

<sup>86</sup>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駐柏林大使密電〉，1900年6月30日，224。

<sup>87</sup> *BPP*, China No. 3 (1900), No. 237, July 1900, 92. 以及 *BPP*, China No. 1 (1901), No. 2, 3 July 1900, 2. 6月16日歐洲媒體已有謠傳德國公使被殺。20日克林德遇害，6月底，德國確認了其駐華公使被殺害的消息。*BPP*, China No. 3 (1900), No. 232, 2 July 1900, 89-90. 19日，6月19日，德皇電報駐各國使節：‘We must never let either Russia or Japan control this affair alone and kick out Europe.’，德皇對此的評論與態度，見Feng Djen Dja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6), 108. 又見張水木，〈德國與庚子拳亂〉，收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十三篇庚子拳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74-77。

<sup>88</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55號，〈皇帝侍從參事大使致外交部〉，1900年7月7日，39；第4562號，〈布婁致駐日代辦〉，1900年7月8日，43。

<sup>89</sup>布婁見此卻又決定改口聲稱德國並不認為英、日有提請委託任務之意，而將不予支持的理由改為疑慮英國或有誘使德、俄衝突的歹念，<sup>90</sup>哈茲斐特事後便向莎士保理解釋德國所採者乃為避免招致俄國之敵視。<sup>91</sup>拉賽爾斯抵達德國不久，於 8 月 22 日(聯軍已於 8 月中攻入北京)陪同到訪的威爾斯親王謁見威廉二世時，曾提及英國政策不受德國支持一事，此時個性自尊的德皇則向他全盤托出，稱日、俄嫌隙固然是考量，但他自己更無法忍受由日本人為德國公使復仇(Even he himself could not have agreed to the murder of a German Minister being avenged by Japanese troops)。<sup>92</sup>

## 五、結語

在 8 月 2 日國會的經費案辯論中，英政府首次公開說明其於中國危機中所採行的政策為何。外交部次長布羅佳克在下議院辯護英國政府對於救援乃是盡心盡力(left no stone unturned)，他說道，英國政府「試圖安撫說服列強並消除日本的顧慮，甚至提供財政支持」，政府真的「盡力減輕可能存在的猜忌」，俾使「列強都知道我們在短時間派遣大軍馳赴天津的唯一目的便是要面對共同的敵人與此巨大的危難」。<sup>93</sup>此語再度宣示英國政府，但同時

<sup>89</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65號，〈哈茲斐特致外交部〉，1900年7月12日，46。

<sup>90</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69號，〈布婁致哈茲斐特〉，1900年7月13日，49-50。

<sup>91</sup>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95號，1900年6月31日，70；第4596號，〈哈茲斐特致外交部〉，1900年7月31日，71。

<sup>92</sup> *Confidential Print*, 7487/308, Lascelles to Salisbury, 22 Aug. 1900, from *B DFA*, Part I, Series E, Asia, vol. 24, 220.

<sup>93</sup> 'I have ventured to trouble the Committee with this detailed statement in order that it may be made perfectly clear from first to last—not merely by example and the evidence which we had ourselves given, by calling up ships from every part of the world, by making matters smooth with foreign Powers with regard to any scruples which Japan might entertain, and even by proffering financial assistance—we have, I venture to think, shown that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have left no stone unturned—either by persuasion, by the use of our own power or the power of the purse of Great Britain—to assuage any jealousies which might exist, and to clear the way for action and to take care that every Power knew that our sole object was that a large number of troops should in the very

也承認日本延宕出兵的原因在於列強間難以消弭的猜忌心。日本的耽擱雖以後見之明而言並未造成使館陷落，但這在當時是完全無法預知的，由此可見德、俄、日實將列強競爭因素置於北京外人生命安危之上，日、俄都不願為了使館微小的倖存機率暫時放下對國際競爭的顧慮，<sup>94</sup> 莎士保理對其他列強無視使館安危的評價實屬貼切而公允。

綜觀英國政府的外交處置，在起初義和團亂事未證明極為嚴重之前，莎士保理拒絕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以避免對中國造成不必要的傷害。而在列強與清朝軍隊衝突後，使館倖存的可能其實已微乎其微，但以政府的責任而言，使館仍存是一個必要的假設，唯此時政治人物經常已經開始打算「後事」，相較而言英國政府當時以拯救人命為念而欲盡量排除政治因素乃是比較有善意誠心的表現。若以利益而言，莎士保理的對華政策一向保守，其理由是當時英國作為在華利益最大的國家，任何事端只會引起其他列強藉機爭勢的機會，不如守成而非進取，這個態度自 1895 年以來便頗為明顯。<sup>95</sup> 相較於各國發兵可能造成救援行動變質為列強競爭，莎氏寧願具地利之便的日本能夠搶先拯救北京的公使團，甚至不以喪失英國主導權為忤（此時印度軍隊尚未到達）。英國政府渴望盡快救人（或查明使館存亡真相），但日本始終有所顧慮而不願先行進軍，於是局勢發展勢必演變成一場政治角力賽，其複雜性與互動性造成事態已非任何國家所能左右，八國聯軍最終就在沒有任何一個列強政府真正滿意的狀況下，攻佔了北京。<sup>96</sup>

---

shortest period of time be sent to Tientsin to meet the common enemy and an overwhelming danger.' Hansard, 4rd S., vol. 87, "Class II," 2 August 1900, c. 485.

<sup>94</sup> J. A. S. Grenville,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309-10. 據德人觀察，俄國到6月底後便改變態度，不願再加派到華北的軍隊，應是已暗中放棄使館。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2卷，第4552號，〈駐俄代辦致德帝國總理〉，1900年7月3日，33-34。

<sup>95</sup> 關於自1895年三國干涉還遼至1899年門戶開放政策期間的莎士保理與英國對華政策，請參見王曾才，〈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策〉，收入氏著，《中英外交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67-226。

<sup>96</sup> 德國遠征軍不及參加，德皇深感失落；英、美、俄皆希望透過與清廷即時溝通救出使館而未果。而除德國外，沒有一個國家是以佔領北京為目的。

## 徵引書目

### (一)文獻史料

1. 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2. 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京：三聯書局，1957。
3. British Parliamentary Papers.
4. Hansard Parliamentary Debates Archive 1803-2005.
5. Ian Nish ed.,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BDFP), Part I, Series E, Asia*, New York: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4.

### (二)近人論著

1. 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編，《中國近代現代史論集·第十三篇：庚子拳亂》，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2. 王世宗，〈「新帝國主義」中的逆流：莎士保理與英國的遠東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6(1996.12)：91-132。
3. 王曾才，《中英外交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9。
4. 李煒，〈論義和團運動時期日本態度的變遷：以日本報刊輿論為中心〉，《東岳論叢》34.7(2013.07)：98-101。
5. 邵蔚，〈從日俄協商到日英同盟〉，東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
6. 相藍欣，《義和團戰爭的起源》，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7. Feng Djen Dja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6.
8. Grenville, J. A. S. *Lord Salisbur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64.
9. Lowe, C. J. *The Reluctant Imperialists: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878-1902*, vol. I-II.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7.
10. Morse, Hosea Ballou.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II. London: Longmans, 1910.
11. Nish, Ia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 1869-1942*.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12. Otte, T. G. "A Question of Leadership: Lord Salisbury, the Unionist Cabinet and Foreign Policy Making, 1895-1900," *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 14:4 (2000), 1-26.
13. Young, L. K.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The British Policy on the Siege of Peking and the Problem of Japanese Relief during the Boxer Rising, June-July 1900**

Han, Hsiang-Chung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is research expounds the attitude and policy of British Government on the siege of Peking legations during the Boxer Rising, 1900. This thesis deals with British policy on the relief reinforcement. The dispatch of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roops could be deemed by China as an invasion, and turning the relief mission into a war. However, saving the Legations was the indispensable obligation of the Powers. At the beginning, the British Cabinet wished to communicate with other countries for cooperation, but this idea was denied by the Prime Minister and as well as Foreign Secretary Lord Salisbury (1830-1903), who reckon the proposal inappropriate and the operation should only committed by individual nation. Later, after the conflict of Taku fort, Lord Salisbury decided to draw Japan the send large army for immediate relief to avoid the assembly of the expeditions of the powers. But due to the hesitation of Japan and the unfavourable attitudes of other Powers, the plan was not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 five sections: 1.Introducti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relief and ulterior actions; 2. Lord Salisbury's apprehension for allies; 3. Britain's proposal to Japan to send immediate relief; 4. The controversy of mandate caused by the encouragement of Britain; 5. Conclusion: British policy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Keywords: Lord Salisbury, Boxer Rising, Eight Nations Alliance, 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China**